山东城市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趋向及动因探析（1912—1937）

郭立珍

（长江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8100）

摘　要：随着烟台等城市开埠、胶济等铁路通车，1912—1937 年山东城市居民的娱乐消费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带动了由曲艺类、餐饮类、社会教育类、体育类、博彩类等多种产品和服务构成的现代娱乐消费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山东城市娱乐消费需求总体上呈增长趋势，消费主体由小众向大众发展，娱乐时间由节庆日向日常化发展，电影、跳舞等西式娱乐方式在青岛、济南的中等以上收入群体中流行，变迁显著的城市、群体非常不均衡，囿于几个通商口岸城市的中等以上收入群体，其他城市以及通商口岸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娱乐消费严重不足，制约着山东城市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进程。

关键词：山东城市；娱乐消费；消费需求变迁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2-0039-10

收稿日期：2025-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L022）：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模式变迁研究（1861—1937）。

作者简介：郭立珍（1972-），女，河南社旗人，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3.001

娱乐消费是精神消费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娱乐消费史是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地处东部沿海的山东，随着烟台等城市的开埠、胶济等铁路的通车，城市居民的娱乐消费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且在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代表性。目前关于近代山东城市娱乐消费方面的研究成果，仅见曲洁的硕士论文运用历史学理论对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化娱乐消费进行梳理①；此外，一些运用历史学、民俗学等理论对济南、烟台、青岛的民俗、休闲等研究中零星含有娱乐消费内容，如牛淑萍、徐畅对济南市民休闲生活②，刘淑丽对烟台演剧荣歇③等研究中或多或少含有娱乐消费内容；刘磊提出“看电影”成为青岛居民的一种新民俗并形成电影空间消费层级④。总之，迄今运用经济史理论对近代山东城市娱乐消费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罕见。因此，本文选取以济南、青岛、烟台为中心，对 1912 年到 1937 年间山东城市娱乐消费的概况、变迁趋向及动力进行探析。

一、山东城市居民娱乐消费的概况

居民的娱乐消费内容受经济发展方式、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山东城市居民娱乐消费的内容与方式是与自然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以农时为节奏，以酬神祭祀庆贺为目的，消费水平低，娱乐设施简陋，中小城市很少有常设性娱乐场所，仅在济南等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商旅来往较多的城市才有戏园、茶馆等常设娱乐场所。民国时期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山东城市居民的娱乐消费内容和方式发生明显变动。

（一）城市居民传统娱乐消费与消费市场的发展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娱乐体系，其中，戏园观剧、书场听书等是居民的主要娱乐方式。

---

①曲洁：《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化娱乐消费初探（1912—1937）》，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②牛淑萍，徐畅：《20 世纪前期济南市民休闲生活变》，《民俗研究》2013 年第 6 期。

③刘淑丽：《近代开埠城市烟台演剧荣歇探因》，《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

④刘磊：《电影院与民国时期青岛的都市民俗》，《民俗研究》2016 年第 3 期。

1.济南传统娱乐消费需求的增长

济南为山东省会，开埠之前已初步形成满足市民、来往商旅等日常消费的娱乐市场体系。19世纪后期，济南建有大舞台、富贵园、明湖居、鹊华居等多家戏园，还有多家专供曲艺演出的书场和“杂八地”，如趵突泉的望鹤亭、四面亭等；除大戏京剧外，具有山东文化特色的山东梆子、莱芜梆子、东路梆子、平调等剧种也很受欢迎；山东梆子的戏班仅在菏泽地区就有35个，济宁地区有33个，泰安地区有12个[①]。

1904年济南开埠后[②]，日常有娱乐消费需要的居民增多，带动经营性娱乐场所的发展。1905年商埠区开始兴建。随着商埠区商业的日趋繁荣，居民娱乐消费有所增长，众多娱乐场所应运而生。1914年济南有戏园7处，城内4处，商埠区有庆商茶园、兴华茶园、俱乐部[③]3处。

20世纪20年代，济南工商业发展速度加快，市民对传统娱乐消费增长，商埠区“新市场”东西两街发展为曲艺街，剧院有“天庆”等4处，曲艺场所有20余处。山东著名梨花大鼓演员谢大玉、孙大玉，著名五音戏演员邓洪山，相声演员马金良，魔术师李福祥，以及评书演员傅太臣，山东琴书名演员邓九如，山东快书名家高元钧等，都曾在这里献艺多年。此外，河南坠子、西河大鼓、兰州布影等在此演出[④]。20世纪后期30年代前期，在居民娱乐消费需求扩大的驱使下，娱乐消费市场不断拓展，1931年6月济南城内外书馆、茶园、布棚共计38处，其中，正规茶园21处，其余为布棚。曲种有山东大鼓、河南坠琴、河间大鼓、评词、相声、双簧等10余个，每天来自农工商学界的听众达3000多人[⑤]。1936年有娱乐场所42家，其中戏园7家，书词茶社26家[⑥]。

此外，每年9月9日众多济南人中高收入者到千佛山祈福，如1924年9月9日，约60000人到千佛山，“从山脚下一直到山上庙里，沿途各个可利用的地方，都摆有桌子，那些能掏起钱的人，在桌边坐着，一边喝茶或小杯烈酒，一边嗑瓜子，观看拥挤的过路人群。上山的人群是由中等和较上等阶层组成的，因为工人没有假日。有数名职员的商店，有些店员可能有机会去”[⑦]。

2.烟台开埠后传统娱乐消费的发展

烟台是山东出现西式娱乐消费最早的城市之一。1862年烟台开埠前是一个以渔业和农业为主的港口、渔村，有一定的商贸活动。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人口增多，1868年常住人口为2.5万多人，1911年5万人，1920年增至15万人[⑧]，为娱乐产品和服务培养了顾客群，书场、落子馆相继建成，“说唱形式有落子、评词、滑稽相声、双簧、河南坠子、大鼓、西河大鼓、茂州歌、杂耍等”[⑨]。光绪年间先后出现过会仙茶园、庆丰茶园、德桂茶园、群仙茶园、瀛洲茶园等[⑩]。清末民初，居民娱乐消费增长较快，烟台“一座不足十万人的小城，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竟拥有大中小型戏院十余座”[⑪]。喝茶观海是烟台士绅和来往商旅传统娱乐方式之一，1932年郭岚到烟台旅游，多次到观海茶社消费，“每当夕阳西下，埠中人士争趋至此，观海游人尤众”[⑫]。

3.青岛传统娱乐消费的缓慢发展

---

①马双：《民国时期济南文化娱乐市场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0页。

②关于济南开埠时间，多数学者采用1904年，这一年是清政府同意开埠的时间；徐华东等采用1905年，因为1905年11月12日为举办了济南开埠仪式，本文采用前一种观点。

③叶春墀：《济南指南》，济南：大东日报社，1914年，第144页。

④徐华东：《济南开埠与地方经济》，济南：黄河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⑤马双：《民国时期的文化娱乐业管控——以山东济南为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⑥济南市政府秘书处编印：《济南市娱乐场所调查统计报告》，1936年，第1-2页。

⑦[美] A.G.帕克：《济南社会一瞥(1924年)(上)》，《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

⑧刘淑丽：《近代开埠城市烟台演剧荣歇探因》，《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⑨烟台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烟台市志(下)》，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第1513页。

⑩刘淑丽：《近代开埠城市烟台演剧荣歇探因》，《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⑪王焕理：《老烟台风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⑫郭岚：《烟台威海游记》，天津：百城书局，1934年，第110页。

青岛建置始于1891年，被强租前，到天后宫赶庙会是大众的主要娱乐活动。天后宫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宫内的戏楼是青岛最早的一座戏楼，春节等节日都会举行庙会，庙会上有形式多样的娱乐项目。曾任青岛中华商公局董事的胡存约描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庙会盛况，“每届新正，口上商民人等群集天后庙，焚香祝祷，年复一年，代代如此，已成积俗。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络绎，杂耍、小场、大书、肘姑（茂腔）、梆柳（柳腔）、秧歌，江湖把式无所不有”①。20世纪初，随着人口的增多，居民日常性娱乐消费需求增加，柳腔、茂腔等青岛人喜爱的曲艺有了日常演出场地，1903年落成的华乐戏院主要演出柳腔、茂腔等地方戏。同年，以流浪卖唱为主艺人为主建成简易小戏院，因这里原来是一片树林，当时青岛人称西大森戏院②。

20世纪初期，青岛戏园、书场等营业不甚发达，因为居民“阶级单纯，只有商人与劳动者”，受制于时间、经济约束，日常看戏者不多，1922年只有戏园1座③。

20世纪30年代，青岛市民的娱乐消费能力提升，戏园、书场等传统娱乐场馆增多，以满足娱乐消费需要。1933年《青岛指南》记录，娱乐场所应有尽有，京戏院有大舞台和同乐茶园2家，落子馆4家，国民大戏院“演蹦蹦戏，每日分日、夜两场，价目分五角、三角、一角三等，茶每壶一角，瓜子每碟五分”；共和茶园有大鼓书、蹦蹦戏、京戏等，聚仙茶园有大鼓书、蹦蹦戏等，国民茶园有京剧、大鼓书等；书场有丁德树说书场、王教顺说书场、刘廷乐说书场、赵唐祥说书场、王兰芝说书场、苗心诚说书场等多家④。

（二）电影成为山东城市娱乐消费的热点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布辛路的“大咖啡馆”放映活动影片，标志着电影的正式公映，清末电影已进入青岛、济南等城市的娱乐市场。

1.清末民初电影消费市场在山东城市的兴起

1900年，青岛德国人所建的亨利王子大饭店设有影戏院，随着观影人数的增加，大饭店的西部又建设了一处小电影场；1902年开业的德国水兵总会（也称水兵俱乐部）内剧场也可以放映电影，最初只对德国官兵开放。1907年8月9日水兵俱乐部的影院，开始向中国人售票，并发布广告：“晚7时放映电影，门票售价预售25分，现购30分”⑤。水兵俱乐部的电影放映场是青岛第一座营业性电影院。

20世纪初电影进入济南市场，1904年秋，济南钟楼寺街的闻善茶园在门口挂出广告，大书文明电影，同时遍撒传单，说“为开通风气起见，不惜工本，特由外洋请到影戏团，里面真山真水、真人真马、真正东洋大战”。最早的专业性电影院是小广寒，建于1904年至1906年间⑥。

1910年，烟台东山基督教堂外国牧师用1部手摇无声电影放映机放映卡通片，为烟台放映无声影片之始⑦。电影初入烟台时，也是戏园兼放电影，1921年前后瀛洲戏院兼放电影。1923年，烟台商人王桂建成烟台第一家商业性电影院—福禄寿电影院，专映国产新片⑧。

清末民初电影进入山东城市娱乐市场，放映的主要是外国片，因文化传统、语言等障碍，拓展市场并不顺利。如济南，“小广寒”开业后的一二年，商埠区由“新舞台”改组的“孔雀戏园”专演电影，票价两角“算起来也不为太贵，但仍是座客寥寥，所以半载之后，也就停歇了”，随后开业的几家电影院也因营业不发达而停歇⑨。20世纪20年代初期，青岛与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相比，电影不甚发达，《大公报》刊文分析，“第一理由是山东的本地人对于这种艺术的鉴赏还够不到程度，虽有一部分江浙两省迁来的人但大多数

---

①鲁海：《青岛旧事》，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②曲洁：《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化娱乐消费初探(1912—1937)》，第9-10页。

③叶春墀：《青岛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8、111页。

④武康，魏镜：《青岛指南》，青岛：平原书店，1933年，游览纪要：第23、25-26页。

⑤青岛市史志办公室：《青岛市志·文化志风俗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89-190页。

⑥陈一愚：《1896—1949中国早期电影观众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⑦烟台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烟台市志(下)》，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第1504页。

⑧王焕理：《老烟台风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⑨《济南电影业之沿革》，《大公报天津版》1927年5月5日，第10版。

是商人，自然没有多大的闲工夫到那种娱乐场所”[①]。

2.1927—1937 年电影消费在山东城市的升温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在青岛、济南等城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国产电影制片业发展的影响下，电影在山东城市逐渐成为娱乐消费的热点。国产影片在山东比较受欢迎，1930 年《大公报》记载，青岛的福禄寿影院专映国产影片“两年来这一家电影院所获利息的数目实可惊人”[②]，甚至连日本人经营的济南电影社“也完全是中华国产的影片”[③]。

在电影消费需求扩大的推动下，山东电影放映业发展起来。1929 年济南电影院“有七处之多，而且处处都是十成座，尤其是‘银光大戏院’一家，简直要卖到十一成！”[④] 1930 年山东已经有电影院 19 家，其中，青岛 8 家，座位 5160 个；济南 7 家，座位 3800 个；烟台 4 家，座位 3750 个[⑤]。1934 年，仅烟台就有电影院 10 余家，且电影在山东其他城市扩展开了，1928 年威海卫建成三星电影院，1936 年威海建成华成电影院，1932 年黄县兴建大华电影院[⑥]。

民国时期电影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引起有识之士重视，被视为“活动黑板”[⑦]，电影教育被纳入社会教育系统中。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山东社会教育的组织实施机构，隶属其管理的民众影戏院 1930 年 11 月成立，“每晚演一场，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加演日场，票价每张一角，每 5 日更换新影片一次”，每晚观众平均 400 余人[⑧]，可见电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山东电影消费市场的扩展。

（三）体育、跳舞等西式娱乐消费的兴起

清末民初山东城市的外侨有一定规模，外侨在租界或租借地建造跑马场、舞厅、弹子房等休闲娱乐设施，在他们的示范引领下，西式休闲娱乐消费在山东城市兴起。

1.赛马活动的兴起

1864 年 3 月英国人在烟台创立赛马会，采用会员俱乐部制，会员由驻烟台的海关官员、西方商人等组成。1864 年 5 月 4 日，烟台举办首场赛马活动，赛马仅有 6 匹。烟台早期赛马比赛是在每年 5 月，后来基于秋季是英国皇家海军、美国远东舰队等国的舰队停泊在烟台港的时间，改为每年 9 月。1872 年烟台赛马，参赛马 22 匹，有大量从上海、天津、牛庄等地特意赶过来观看赛马的官僚、富商等，烟台赛马活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⑨]。

民国时期，赛马会是青岛的一项重要活动，赛马场的规模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1901 年德国建成了可供德国军民娱乐的跑马场，20 世纪 20 年代青岛收回后，仍做赛马活动用。20 世纪 30 年代，青岛“每月赛马四次，均于星期日举行”[⑩]。跑马场的门票每张 3 角，有大量赠送，收入主要靠赌马，据统计每年比赛 58 场到 60 场。每逢赛马日，参赛的马收入栏费 5 元，每场赛后，头马获奖金 200 元，二马获 100 元，三马获 50 元。赌马的马票分四种，即独赢票，每张 1 元至 3 元，马位票每张 3 元，摇彩票每张 3 元，每场最末一次每张 5 元，大香槟票，春秋两季每张 5 元，夏季每张 10 元。每场比赛一般 10 回，有时赌马人数多可达十四五回。在北平、天津也代卖马票。大官、豪门也专来青岛赌马。每场可净赚 30 万元，可谓甚巨。为掩人耳目，从中拿一些开展体育活动[⑪]。参与赛马活动者主要是居住在山东的外国人、官僚、富商，以及来

---

①《青岛之电影适应》，《大公报天津版》1930 年 5 月 11 日，第 10 版。

②《青岛之电影事业》，《大公报天津版》1930 年 5 月 11 日，第 10 版。

③《济南电影事业的一个报告》，《大公报天津版》1928 年 2 月 21 日，第 10 版。

④柏岩：《济南的电影界》，《大公报天津版》1929 年 3 月 5 日，第 15 版。

⑤《上海市年鉴 1935（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年，第 306 页。

⑥烟台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烟台市志（下）》，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 年，第 1496 页。

⑦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电影教育实施概况》，时间和出版社不详，第 1 页。

⑧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施概览》，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1933 年，第 9、12-13 页。

⑨参考魏春洋：《近代烟台赛马》，《走向世界》2020 年第 38 期。

⑩武康，魏镜：《青岛指南》，青岛：平原书店，1933 年，游览纪要：第 29 页。

⑪鲁海：《青岛旧事》，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年，第 60-61 页。

自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官僚、富商等热爱赛马者，赛马日也有很多普通市民前往观看。

2.其他西式娱乐在山东的兴起

一是打弹子的兴起。打弹子（即西式台球、保龄球），最初是外国侨民将其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带入中国。弹子房的顾客群最初主要是外国侨民、城市的高收入者。随着台球的普及，一些富人家庭的子弟、学生以及商人、士绅等也在弹子房内进行休闲娱乐。1933 年，青岛有个台球房 7 个，主要日商经营，多数定价每盘四角①。1934 年济南有进德会、青年会、中华球社，球房 3 处，每点钟一角②。

二是跳舞等娱乐的兴起与发展。源于西方的跳舞场，随着烟台等城市的开埠，进入山东城市。烟台的跳舞场等大都是为西人——尤其是美国水兵预备的③。青岛，1899 年落成的青岛德国大饭店内设音乐厅、舞厅等娱乐设施。1902 年开业的水兵俱乐部，设有酒吧、咖啡室、舞厅等娱乐设施④。夏季是青岛娱乐消费的旺季，前来旅游避暑的国内外游客众多，加之美国水兵在青岛休整，舞厅、咖啡厅、酒吧间等西式娱乐场馆也因此呈现季节性变化，夏季舞厅、咖啡厅、酒吧间等场馆林立，一到秋季美国水兵离开青岛，这些场馆纷纷停止营业，经营此种投机生意者，以白俄人为最多，但是“终年设立，以供一般中西摩登青年之需要”也不少，如跳舞场，20 世纪 30 年代有 9 家⑤。

三是其他西式娱乐活动的出现。20 世纪 30 年代，高尔夫等体育娱乐在山东城市有一定市场，如青岛有小哥儿夫球场 2 个⑥。此外，民众教育馆也提供一定的西式娱乐设施，如省立民众教育馆内的民众俱乐部内有乐器 9 种，棋类 12 种，及乒乓球等球类，“以此部最为热闹，平均每日有一百余人参加”⑦。

二、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娱乐消费变迁的趋向

通过对 1912 年至 1937 年间山东城市娱乐消费的考察，能够看出这一时期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变迁的基本趋向。

（一）消费主体：由小众向大众、由个人向集体发展

清末山东城市娱乐消费的主体为官僚富商、士绅等，日常有娱乐消费需求的人数规模不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济南等城市居民的娱乐消费，已经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有面向官僚富商、士绅、知识群体等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大戏院、电影院、舞厅、球房等娱乐场馆，也有面向产业工人等中低收入群体的书场、落子馆等休闲娱乐场馆。如青岛三大综合市场中，占第一位是台东商业市场，1928 年建成，拥有购物、餐饮、娱乐三大功能，市场内有戏院 1 座、说书场 3 家，光陆戏院放映电影。积庆里市场内有一家电影院“光陆电影院”，是一家三轮电影院，票价便宜只相当于头轮影院的三分之一，没有收入的青少年多来这里看电影。台镇东商业市场、威海路平民市场、莘县路东海楼、海泊路广兴里等处的书场，无一定价目，为“平民工余娱乐之需而已”⑧。

尽管民国时期城市娱乐消费支出的主体仍然是个人及家庭，但民国时期在社会教育运动发展的影响下，政府已经成为娱乐消费的主体。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包括民众影戏院、民众茶园、民众俱乐部、儿童俱乐部，本部暨影戏院、实验区 3 处各有独立预算，1933 年本部经费 49824 元，影戏院 14792 元，实验区 4980 元，3 处共 69596 元。临时费，1932 年 3430 元，用于建筑及设备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内的民众游

---

①武康，魏镜：《青岛指南》，青岛：平原书店，1933 年，游览纪要：第 28 页。

②罗腾霄著，济南市图书馆整理：《1934 济南大观》，济南：齐鲁书社，2011 年，第 433 页。

③郭岚：《烟台威海游记》，天津：百城书局，1934 年，第 17 页。

④曲洁：《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化娱乐消费初探(1912—1937)》，第 12、13 页。

⑤武康，魏镜：《青岛指南》，青岛：平原书店，1933 年，游览纪要：26-27 页。

⑥武康，魏镜：《青岛指南》，青岛：平原书店，1933 年，游览纪要：第 29 页。

⑦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印：《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施概览》，1933 年，第 13 页。

⑧武康，魏镜：《青岛指南》，青岛：平原书店，1933 年，游览纪要：第 25-26 页。

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印：《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施概览》，1933 年，第 8 页。

戏院，每晚演一场，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加演日场。民众茶园，内陈通俗书报及各种棋类乐器等[①]。

（二）娱乐空间：综合性、大众化发展

随着城市居民娱乐消费多元化、大众化发展，融娱乐与餐饮、商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游艺场兴起。游艺场就好比娱乐超市，一般实施一票制，里面提供形式多样的娱乐产品和服务，目标群体是大众。首创这一商业模式的是上海“楼外楼”，开业后生意兴隆，因空间狭小，另购地建造一家大型游乐场——新世界，1915 年 8 月 4 日开业，获得巨大成功，带动游艺场在全国的发展。济南的大观园、进德会游艺场，烟台的进德会游艺场等都是仿照上海新世界的建筑式样和经营方式。

济南早期的大观园北门里为四面厅茶社，可出钱点曲。南门里东边有第一剧场演出京剧。西边靠北的第二剧场放映有声电影院。第三剧场在影院南，后改称小乐戏园。外商场有新明电影院、新新舞台和三五个说书棚、杂耍场。商场起初进入商场需购门票，每张两角。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中期，大观园曾一度呈现畸形繁荣。这段时间群众娱乐场所有大小剧院 6 所、影院 2 所、茶社 3 所、明地书曲杂耍场 4 块。戏剧上演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和地方戏，曲艺演出西河大鼓、快书、相声等[②]。

烟台进德会，娱乐项目、经营方式也借鉴上海大世界，最火爆的是京剧，电影院 1936 年开始上映有声电影，这里还轮换上演京韵大鼓、相声、双簧、快书、评书、魔术及其他游艺节目[③]，是 20 世纪 30 年代烟台市民的重要休闲娱乐空间。

（三）消费内容：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居民的娱乐消费内容仍以戏园观剧、书场听书、茶馆品茗等传统娱乐产品和服务为主，但电影等现代娱乐消费需求增长迅速。居民娱乐需求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带动了娱乐产业的发展。青岛，娱乐场馆“应有尽有，如京戏院、影戏院、说书场、落子馆、跳舞厅、弹子房、跑马场、俱乐部、篮球会、足球会等，皆有相关组织”[④]。济南，娱乐场所也能满足居民多元消费需求，娱乐场所有：商埠市场进德会、大观园、京剧园、电影院、评戏院（坤书有京大鼓、奉天大鼓、八角鼓、山东大鼓、评书、弦子书、杂技）、清茶社、围棋社、球社、妓馆等[⑤]。

20 世纪 30 年代，在娱乐消费需求扩大的推动下，青岛、济南初步形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多元并存的娱乐消费市场体系。提供的娱乐产品和服务可归纳为六类：一是曲艺等演出类，包括戏园戏院、书场茶社等；二是娱乐性餐饮类，包括清茶楼、咖啡馆、酒吧等，餐饮场所是近代中国城市居民的重要娱乐场所；三是社会教育类，包括公园、植物园等；四是体育类，主要包括球场、弹子房等；五是博彩类，包括跑马场等；六是色情等不健康类活动，民国时期视黄赌毒为正当娱乐。

三、山东城市娱乐消费变迁的主要动因

引发一个城市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居民数量和构成、收入水平、消费环境等，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上述因素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城市居民人口规模和构成变化的促进

1.城市居民规模扩大、构成多元化

居民数量增加和构成多元化是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关键因素。清末民初青岛、济南、烟台等城市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些城市，人口的增加为娱乐消费需求的扩展奠

---

①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施概览》，第 42-43 页。

②李万鹏等：《济南城市民俗》，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 年，第 101、103 页。

③王焕理：《老烟台风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年，第 214 页。

④武康，魏镜：《青岛指南》，平原书店，1933 年，游览纪要：第 23 页。

⑤罗腾霄著，济南市图书馆整理：《1934 济南大观》，济南：齐鲁书社，2011 年，第 422 页。

定基础。1916年青岛居民，中国人69252人[①]，到1923年增长到262117人，1930年增至379082人，1934年青岛人口高达452379人[②]。民国时期济南等山东其他城市人口数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11年人口规模为275300人，辛亥革命爆发时局不宁，人口有所减少，但总体趋势是增长的，1927年达到337835人[③]。20世纪30年代山东已经形成一批大中城市，青岛、济南人口已经超过40万（如表1所示）。

表1　20世纪30年代山东主要城市人口统计表

城市	年份	非农业人口（人）	农业人口（人）	合计（人）	非农业人口占比%
青岛	1933	——	——	436772	——
济南	1933	257394	170378	427772	60.2
烟台	1933	126209	13303	139512	90.5
威海	1932	101572	94058	195630	52
潍县	1932	82781	——	647086（全县）	12.8
周村	1932	56620	——	271350（全县）	20.86
博山	1929	37563	——	184134	20.4

注：上述这些人口中，都可能包括有部分农业和渔业人口。潍县、周村、博山和龙口，都是单指的城市人口，各城市的人口中，都包含有外国人。资料来源：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0页。

清末至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居民构成多元化发展，如随着移民到青岛的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等省商人增多，1907年三江会馆落成，主要服务于4省商号的同乡会活动，会馆搭建的戏楼可容纳400多人，演出时间并不集中在节日，更为日常化[④]。山东城市还居住有数万名外侨，20世纪30年代初期青岛有外国人1.3万多人，济南有外国人1万多人，威海有外国人88人[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居民的娱乐模式有一定差别，人口数量增加、构成多元为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娱乐活动形式多样化发展奠定基础。

2.城市居民职业构成多元化

职业不仅决定居民的收入水平，还影响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封建社会中国城市居民从事的职业，可概括为士、农、工、商4类。清末民初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山东城市居民职业构成多元化趋势凸显。如烟台开埠后，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就业机会，1891年从业人口约有32500，从事的职业就可以分为12类，其中，装卸工与其他工人数量最多，10650人；其次，为商店、油房等，9620人；排在第三位的是叫卖小贩，5500人[⑥]。20世纪30年代新兴职业的不断涌现，居民职业构成更加复杂。1933年《青岛指南》将居民职业划分为14类，其中，从事商业者40691人，工业64814人，农业201005人，渔业8546人，公务员役5068人，学龄儿童34229人，教员1054人，医生306人，律师及其助手123人，传教士35人，新闻记者77人，妓女656人，其他职业12222人，无业及失业者约40000人，不包括外侨[⑦]。居民职业构成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收入群体，这些人又形成不同的娱乐消费模式。

（二）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推动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近代山东城市居民按照收入水平的高低可把可以分为高、中、低三大群体。1926年12月北京市警察厅将住户按照贫富程度分为极贫户、次贫户、下户、中户、上户五种类型进行调研，极贫户指毫无生活之资者；次贫户指收入极少，不赖赈济则不足以维持最低之生活者；下户者指收入仅足以维持每日生活者。根据调研数据得出五种类型家庭的占比，上户4.1%，中户22.4%，下户47.3%，次贫户为

①叶春墀：《青岛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8页。

②赵君豪：《青岛导游》，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10页。

③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0、423页。

④曲洁：《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化娱乐消费初探(1912—1937)》，第9-10页。

⑤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0页。

⑥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⑦武康，魏镜：《青岛指南》，青岛：平原书店，1933年，总论：第12-13页。

9.3%，极贫户占比16.9%。尽管划分不精准，但是作为每年冬季筹备冬赈使用，“其数字可认为大致无误”①。巫宝山参考1926年北京警察厅居民收入构成比例，并将极贫户、次贫户、下户合并为“下户”，把山东非农业人口按照上户、中户、下户三种类型进行划分，上户占4.1%，中户占22.4%，下户占73.5%的比例②。城市为非农业人口集中地，上述推算尽管不精准，但能大致反映出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居民收入阶层的构成情况，其中“上户”相当于当前的高收入群体，“中户”相当于中等收入群体，“下户”相当于低收入群体。

1.高收入群体形成一定规模。民国时期青岛、济南、烟台等城市官僚、买办、工商金融资本家，收入丰厚，消费能力强。这一群体的数量难以精准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工业、商业、金融业发展必然产生出一批高收入者。1924年济南有27家银行和190家钱庄，警察登记的各种店铺3500家，外国人经营的店铺和商行为425家③。济南，1937年有工商各业商店3320家，使用人数19954人④。青岛工业化进程位居山东第一，1933年在全国12个工业城市中位居第三⑤。

20世纪30年代山东主要城市工商业都有一定发展，济南有机器工厂236家，手工工厂219家，商店1228家，银行11家；青岛有机器工厂101家，手工工厂1603家，商店7143家，银行12家；烟台、潍县、周村、济宁、龙口、泰安、博山、威海等城市的现代工业也已经产生（如表2所示）。

表2　20世纪30年代初期山东城市工商业发展概况

城市	机器工厂数	手工工厂数	商店家数	银行家数
济南	236	219	1228	11
青岛	101	1603	7143	12
烟台	13	342	524	3
潍县	30	78	282	4
周村	12	500	727	——
济宁	11	——	191	2
龙口	4	——	162	1
泰安	3	——	——	——
博山	6	——	——	1
威海	4	65	358	2

资料来源：根据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3-665页的表中数据编制。

由表2能够看出20世纪30年代山东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概况，上述工商业投资者和主要经营者等是山东城市高收入群体的基本来源，这部分人规模不大，但引领娱乐消费的潮流，颇具示范效应。

2.中等收入群体初具规模

中产阶级研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米尔斯提出，中产阶级有新老之分，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等，社会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周晓虹提出新中产阶级就是“中等收入阶级”⑥。很多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阶级与中等收入群体内涵相同。民国时期陶孟和已经提出，小学教员与书记、录事、警官及银行公司之小职员每月之进款相差无几，平均约合40元之谱，自经济方面言之，实可谓属于同一阶

①参考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②张国刚：《中国家庭史·民国时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305页。

③（美）A.G.帕克：《济南社会一瞥（1924年）（上）》，《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

④根据徐华东：《济南开埠与地方经济》，济南：黄河出版社，2004年，第55页表中数据得出。

⑤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⑥周晓虹：《〈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读书》2007年第5期。

级；还有工资较高的工人，如汽车夫、机械工人及电气工人等，也可认为与小学教师同属一阶级，代表北平一部分之下户及大部分之中户家庭[①]，他还将这一群体称为“中产阶级”和“中产家庭”[②]。

民国时期山东城市的“中户家庭”或者称中等收入群体已经初具规模，这一群体一般受过中等以上教育，收入较高且稳定，生活条件较好，有一定的娱乐消费支出，是推动山东城市娱乐消费变迁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山东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凭借知识与专业技术获取报酬的群体，职业包括政府公务员、警士、教员、医生、律师、新闻记者、专业技师等。1933 年青岛有教员 1054 人，医生 306 人，律师及其助手 123 人，传教士 35 人，新闻记者 77 人[③]。另一类是工厂里的管理人员，即职员，还包括一般商店中的掌柜等。表 2 的工商业投资者和主要经营者、管理者、技术人员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如 1934 年，济南有工厂 137 家，职员 1131 人[④]。

3.低收入群体规模大

低收入群体尽管消费能力低，但人数多，他们也有一定的娱乐消费支出，是推动娱乐消费变迁的不可忽视群体。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众多的设施简陋的书场、落子馆等都是因这一群体而发展起来的。1895 年山东全省产业工人数量约 5000 人，1898 年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后，德、英、日等国相继在山东建港筑路、设厂开矿，产业工人到 1911 年增加到约 3 万人。20 世纪 20 年代末，民族工业发展较快，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中外厂矿企业中的工人数量已有 5 万多人[⑤]。

（三）娱乐消费产品与服务不断改良

消费环境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选择，近代山东娱乐消费环境不断优化也是引发居民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因素之一。

一是娱乐产品和服务供给充分。20 世纪 30 年代山东的开埠城市不仅有面向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大戏院、电影院、舞厅、球房等娱乐设施，还有诸多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休闲娱乐设施，面向各个收入群体、不同娱乐偏好的娱乐产品和服务。此外，社会教育机构也提供一定的免费或低价娱乐产品和服务，为娱乐消费需求变迁提供了条件。

二是戏园、影院设施的提档升级。传统的戏剧演出舞台，空间狭小，观剧的环境、座位的舒适度与西式舞台相比有一定差距。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人姚伯欣等联合京剧界借鉴上海租界内兰心大剧院式样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新式舞台，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初二开幕获得巨大成功，引发了各地改造戏园或建造戏院的热潮。为与旧式戏园相区别，有些地方称新式戏园为“剧场”“戏院”或“新舞台”，1916 年济南已经有戏院 8 个[⑥]。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随着电影成为城市娱乐产业的重要增长点，山东出现一个新建和翻建电影院的浪潮，如翻修后的福禄寿大戏院“添加水银幕，尚称完美，且因地址适宜，取价稍廉，专映国产影片，更为一般人所乐就；连日皆卖满座”，明星电影院“座位舒适，布值幽雅；冬有暖炉，夏则电扇；且选片极慎，不让天津之大影戏院”[⑦]。戏园、影院设施的提档升级，价格逐渐平民化，激发了更多人走向娱乐场馆进行消费。

三是交通、照明等设施改善。中外商人和国民政府对烟台、青岛等城市的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同时把快捷的、便民的交通工具引入山东城市，便利了市民出行。此外，照明等设施也得到不断改善。交通、照明等条件的改善延长了山东城市居民娱乐消费的时空。

---

①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7 页。

②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 51 页。

③武康，魏镜：《青岛指南》，平原书店，1933 年，总论：第 25-26 页。

④徐华东：《济南开埠与地方经济》，济南：黄河出版社，2004 年，第 64 页表。

⑤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劳动志》，第 131-133 页。

⑥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济南市志资料：第 3 辑》，济南：济南出版社，1982 年，第 21 页。

⑦《青岛的影戏院》，《大公报天津版》，1928 年 7 月 31 日，第 10 版。

结　语

通过对1912年至1937年山东城市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考察，可以得出：与清朝后期相比居民娱乐消费需求总体呈增长趋势，大众化、日常化彰显。从消费主体来看，中等以上收入群体是推动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主力。从娱乐方式，传统娱乐消费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西式娱乐出现在青岛、济南等城市的中等以上收入群体娱乐消费中。从变迁区域来看，变迁城市、群体非常不均衡，娱乐消费变迁比较明显的城市、群体，为青岛、济南、烟台等几个通商口岸城市的中等以上收入群体。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共有108个，但多数为州县级城市，这些城市和农村集市尚无多大区别，娱乐消费严重不足。即使开埠城市威海，因贸易规模小，娱乐场所营业不发达，1932年书馆有4个，“永庆、新明，其二已关闭”①。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无娱乐消费能力群体占比过高，制约着山东城市娱乐消费需求。山东非农业人口中，“下户”即低收入群体占比高达73.5%，其中极贫群体占比高，1925年无业游民占青岛人口总数的34.3%②。多数产业工人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如1931年济南市织布厂工人平均月工资2.74元，每日工作时间13个小时；毛巾厂工人平均月工资3.14元，每日工作时间13个小时③。据统计济南1名单身工人的生活费为7.5元，一个5口之家为15元④。20世纪30年代山东最便宜的电影应为民众电影院，此类影院为非营利性质，票价“自一角至五分”⑤，即便如此，对于月薪只有三两元的低收入者来说，看电影也是一种奢望，更不用说大量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极贫者。

Study on the Trend and Motivation of Changes in Urban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Demand in Shandong Province (1912—1937)

GUO Li-zhen

(School of Business, Chang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pening of Yantai and other ports and the opening of Jiaoji and other railways, the content of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in Shandong chang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1912 and 1937, which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market system composed of folk art, catering, social education, sports education, gambling and oth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overall trend of urban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demand in Shandong was on the rise, which the main body of consumption had evolved from niche to mass, and the time of entertainment had evolved from holiday to daily, with entertainment such as movies and dancing becoming popular among the above-middle-income groups in Qingdao and Jina. However, this change was extremely uneven among different cities and groups, confined to the above-middle-income groups in a few trading port cities, and insufficient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among the low-income groups in trading port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which restricted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 of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demand in Shandong cities.

Key words: Shandong city;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changes in consumption demand

[责任编辑　山阳]

①郭岚：《烟台威海游记》，天津：百城书局，1934年，第69页。

②任银睦：《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95页。

③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济南市志资料：第3辑》，济南：济南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④[美] A.G.帕克：《济南社会一瞥(1924年)(下)》，《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⑤罗腾霄著，济南市图书馆整理：《1934济南大观》，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第429页。